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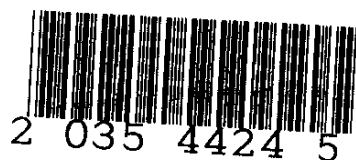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拿破仑时代

上卷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著





2 035 4424 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拿破仑时代

上卷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著

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60k 01/22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出版的题为《民族与文明》丛书的第十四卷。《民族与文明》是一部以欧洲和法国为重点的世界通史丛书，其中第十三卷《法国革命》<sup>①</sup>和第十四卷《拿破仑时代》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撰写的。

乔治·勒费弗尔(1874—1959年)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四十五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1932年他继阿尔贝·马迪厄当选为“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志主编，1935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勒费弗尔保持了马迪厄学派注重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推崇雅各宾民主专政的史学传统。他对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著作。关于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都有专著论述。

本书是勒费弗尔于三十年代初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时，边讲课边撰写的，1935年完稿出版，到1953年已出了第四版。他的学生阿尔贝·索布尔在他逝世后负责整理他的遗著，1965年印行了由索布尔增订的第五版，1969年值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又印了第六版。索布尔对原著正文增订不多，但对勒费弗尔开列的参考书目则有所补充。这部书从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并译

---

<sup>①</sup> 《法国革命》一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约、萨尼亚克合著，1930年初版；1951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年印行了第六版。

成多种文字。

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和欧洲的这段历史。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法英、法俄争夺霸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但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揭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仑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断言：“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161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于拿破仑的“性格”：“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同上），并概括地说：“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68页）

我们并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sup>①</sup>但是任何性格都脱离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中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既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以致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益。于是他又用“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64页)来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争总是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归根结蒂拿破仑“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寻找，而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寻找。正如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sup>②</sup>这就是说，拿破仑建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sup>③</sup>正是拿破仑的不断战争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③ 同上，第158页。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为“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144页）他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国的部分，他只把远东地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的战争，远东早已被西方列强侵占了，“欧洲的内哄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299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内容，中译本书名增加“时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下卷由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全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参照英译本进行了校订。中译本除增加一些译注外，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别附在各编、各章节的页下。我们只择其要者选录，把参考书目集中附在上下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1977年7月



# 目 录

绪言 .....	( 3 )
----------	-------

##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	( 5 )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	( 6 )
二、思想的冲突 .....	(11)
三、民族的觉醒 .....	(24)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	(29)
一、大陆各国 .....	(29)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	(33)
三、法国及其盟国 .....	(38)
四、封锁与中立国 .....	(44)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	(49)
六、和平的条件 .....	(61)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	(64)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	(64)
二、拿破仑·波拿巴 .....	(67)

##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1799—1802年)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	(75)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	(75)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	(81)
三、仓猝上阵的 1800 年战役 .....	(95)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	(98)
一、1800 年战役与吕内维尔和约 .....	(99)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	(107)

三、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 .....	(112)
四、附庸各国的改革 .....	(117)
<b>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b>	<b>(123)</b>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	(123)
二、教务专约 .....	(134)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	(141)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	(149)

### 第 三 编

#### 提尔西特条约前帝国的对外征服(1802—1807年)

<b>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1802—1805年) .....</b>	<b>(162)</b>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	(162)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1804年) .....	(176)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特拉发加海战(1805年) .....	(183)
四、封锁 .....	(191)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	(195)
<b>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b>	<b>(211)</b>
一、征募与晋级 .....	(211)
二、战争准备 .....	(220)
三、战争指挥 .....	(224)
<b>第三章 大帝国的创立(1805—1807年) .....</b>	<b>(228)</b>
一、1805年的财政危机 .....	(228)
二、1805年战役 .....	(233)
三、大帝国 .....	(238)
四、与普鲁士决裂(1806年) .....	(246)
五、耶拿战役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役(1806—1807年) .....	(252)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 .....	(260)
<b>上卷参考书目(提要) .....</b>	<b>(271)</b>

## 绪 言

1

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争要一直延续到1815年。在这场战争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内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sup>①</sup>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而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所

---

<sup>①</sup> 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权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机构。热月反动后权力削弱，1795年10月27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委员会时，均指它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发挥专政作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sup>2</sup>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能置之不顾;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仑所征服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宗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丁美洲已在争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争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远东,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内部斗争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时间里,在拿破仑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3

###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张显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sup>①</sup>认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

<sup>①</sup> 索雷尔(1842—1906年)，法国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八卷本《欧洲与法国革命》(1885—1904年出版)。——译者

##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年）宪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产业<sup>①</sup>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

<sup>①</sup> 字面意思是国家的财产，实际指法国革命时期国家从僧侣、贵族和其他人手里没收的财产。——英译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sup>①</sup>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拿，费希特因 6 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 1799 年被 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 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 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向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

<sup>①</sup> 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之一，于 1791 年由杰佛逊领导建立，1794 年改名“民主共和党”，是 1828 年建立的民主党的前身。现在共和党的前身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译者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



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年出任大臣之前治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sup>①</sup>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 8 巨头，他们使贵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

<sup>①</sup> “私囊选区”指由一人或一家控制的议员选区。“腐朽选区”指具有同等选举权但居民比其他选区少得多的衰落选区。——译者

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年终于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sup>①</sup>,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年考虑过的废止豁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sup>②</sup>,是一

---

① 里沃尼亚省在波罗的海沿岸,原以里加为省会,该省现分划入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译者

② 玛丽亚-卡罗莉娜是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姐姐。——译者

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沒能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这个结论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沒有妨碍过各国君主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沒有放弃顽固的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年12月22日，格伦维尔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思想。1800年1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年2月3日称之为“革命彩票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10 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另一些人则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 11 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12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样。这种和神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年就翻译了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感的约瑟

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sup>14</sup>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有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上学赋予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

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们陷入忧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

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sup>①</sup>，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

<sup>①</sup> 《奥西安诗选》是苏格兰作家麦克孚生在1760年伪造出版的。奥西安是传说中公元三世纪的苏格兰吟游诗人，麦克孚生假托是从古代凯尔特语翻译来的，其实是他自己写的。诗歌情调哀怨悱恻，风行一时，也为波拿巴所爱好。——译者

16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sup>①</sup>，1800年左右在英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英国国教的信仰。华兹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年止，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sup>②</sup>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

---

<sup>①</sup> 由于华兹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三位诗人都住在英国北部的沿湖区域，因此被称为“湖畔诗人”或“湖畔派”。——译者

<sup>②</sup> 韦尼奥(1753—1793年)是法国革命中的演说家，吉伦特派头面人物，1793年10月上断头台。——译者



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1796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年）和《钟之歌》（1799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sup>17</sup>、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

的人,把“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1798年在德累斯顿,1799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他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

18 艺术品。这是一种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年至1804年间,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没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达到

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1799年起，诺瓦利就歌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19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从 1798 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 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家族”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在 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 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洛是一个虔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  
20 卫斯理已于 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

教。① 这种情况在 1797 年引起了循道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里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长老派和普赖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弩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

---

① 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英国牧师，1729年在牛津创立循道教派（我国也译作“卫理公会”、“监理会”），虽反对英国国教腐化而自立山头，但卫斯理晚年又渐接近英国国教，现在成为基督教主要派别之一。——译者

② “非英国国教信徒”(dissent)指不奉国教的其他各教派的新教徒。——译者

③ 浸礼会派(也译作“浸信会”)出现于十七世纪，主张只为成年人施洗礼。——译者

④ 索西(1525—1562年)是意大利新教徒，反对耶稣的神性，开创了一个异端教派。——译者

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年左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年，当斯塔埃尔夫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没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感情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没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并不是毫无效果的。1790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年左右弗朗索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1815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并且深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 1798 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债务和国内税收，但要负担帝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市场，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国务大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宣誓条例”；<sup>①</sup> 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为爱尔兰国教的可能性，如果政府有权对主教的选择进行监督的话。对这一点，有十个主教表示同意。而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很多爱尔兰的新教徒起来反对合并，这些人起初由于害怕曾拥护过这个合并计划。皮特无奈，只好采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钱进行贿赂，不过这些钱还是出自爱尔兰身上。合并问题终于在 1800 年 2 月 5 日在都柏林表决通过，5 月间在伦敦得到了批准。

逐渐引起从世界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的是战争。受到各方面

---

① 英国宗教改革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总的内容是除英国国教徒外，任何人不得充任公职，要求文武官员就职时均须宣誓效忠英王，承认英王为教会最高首领等等，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此反感极大。英国到 1829 年，爱尔兰到 1871 年才废除此项法律。  
——译者